

# 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ZHONGGUO GUANWENHUA DE DIANJIZHE YU PIPANJIA

KONGZI YU MAOZEDONG

## 孔子与毛泽东

刘永佶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

# 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孔子与毛泽东

刘永佶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刘永  
佶著. -2 版.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7

ISBN 7-209-01638-4

I. 中… II. 刘… III. ①官-文化-研究-中国  
②儒家-研究③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G122

## 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孔子与毛泽东

刘永佶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版

1999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8001—11000

ISBN7-209-01638-4

D·422 定价:20.00 元

## 序

官文化,这是我对中国古代文化长期探索得出的一个范畴。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的思想基础,又是官僚地主阶级以官僚政治所推广并维护的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骨架,作用于我们祖先的思想和行为,残存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观念中。官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它曾促进过古代中国的发展,又是近、现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

孔丘和毛泽东是中国文明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人,而他们二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还在于中国文化的骨架,即官文化上。孔子为其奠基,2500年后的毛泽东则对之进行全面批判,并以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来取代它的统治地位。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从文化角度说,仍是毛泽东所开创的批判官文化、建设民主文化的阶段。对于官文化,我们要继续认识和批判,这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官文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孔丘那里奠基,并由秦始皇、刘邦及以后各代帝王将相、儒学宗师们承继并发扬。悠悠两千多年,官文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全面的作用,它有着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内容。它曾经是历史上中国走在当时的现代化前列的必要条件,它又在近200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成为今天的现代化的后进者的主要文化因素。批判和消除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必要内容。而这,恰由毛泽东以他毕生的精力和思想,来倡导,来实践,

来发动人民群众以革命行动所从事的。

我曾两次去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第一次是在1966年10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我们几个中学生，随着“大串联”的洪流，来到这块“圣地”。在这里，我和数以十万计的崇拜者，排队瞻仰毛泽东的故居，人流匆匆，几乎来不及细看，就被后面的人群挤出来了。这次留给我的是激奋，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和崇拜。后来，我常回忆起那时的情形，总有许多疑问：是什么力量唤起了人们如此的激情？为什么会对毛泽东有如此的敬仰和崇拜？第二次是在1986年的6月，我到长沙参加一本书提纲的论证，抽空与两位同事专程去的。第一次去韶山，是站在部队的敞篷汽车上；时过20年，则是坐一辆外国进口的小车。20年前，路上车流不断，如今，则清静得很。到清水塘前下车，我们很是仔细地观看了毛泽东故居的各个细节，并从容地照相，甚至到毛泽东父母的坟前转了转。

时隔20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1986年，是毛泽东在中国受到冷遇的时候。我也是以冷静并已成熟的心态，来联想20年前的那些疑问。人的情感和思绪是如此奇妙，我在韶山解不开的谜，到曲阜，却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

我是1988年夏天，随着一次会议，到曲阜——孔丘的故乡参观的。孔庙、孔林、孔府，这里的高墙大厦，精美的装修和富丽的家什，尤其是“大成殿”的龙柱，使我想到北京的故宫和清西陵。再看孔丘坟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石碑，我立即有了一个“！”式的结论：孔丘是官，是一个跨越两千余年，历经各朝各代的“永恒性”的官。其地位虽低于皇帝，但他的声望、作用，却高于所有的帝王。

看着这人世间最大的官府，又想到韶山冲清水塘后面的茅草屋顶和泥土抹的墙。那道地的几间“寒舍”里所透出的浓烈的农家气息，与孔府中这高宅深院里弥漫着的酸腐气相比，宛如两

重天地。在毛泽东的故居，我感到自然，感到亲切，感到自身的价值；而在孔丘的故里，我却感到了专制统治的威严，感到压抑，感到似乎被关在牢狱。我突然想到两个字：“民”与“官”。对，从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诞生地，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巨大差异，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

毛泽东是“民”的化身，而孔丘则是“官”的代表。这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最为集中、最为抽象的体现，也是这两位文化巨人思想体系的实质区别之所在。

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当我将方法论的研究告一段落，并着手专门探讨中国的经济矛盾之前，曾用一段时间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我将它称作“劳动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真正的、从人的本质（其核心是劳动）出发的人道主义。<sup>①</sup>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中，贯穿并突出地表现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而孔丘，他的学说可谓他那个时代最为“人道”的，他本人反复强调并解说的“仁”，恰是他的“人道”的体现。但与马克思和毛泽东相比，孔丘的“人道”，是“官”的人道，是一种宗法的、官僚统治的观念。而这一点，又是中国两千余年集权官僚制社会的实质所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是中国亿万个被“官”管、被“官”治的“民”的利益和意识，当他将这种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时，也就获得了现代的、先进的意义，从而也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和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虽然毛泽东并未完成对官文化的批判，而且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有过失误，甚至在他晚年的行为中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官文化，但他却向世人昭示了这个真理：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代官僚政

---

<sup>①</sup> 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书，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治,以社会主义文化取代官文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来写这本书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旭茂同志,在这个题目上与我有相通的认识,我只是在1992年长春《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上,偶尔说到这个话题,他就紧追不舍,促我写下来。这大概就是“助产士”的作用吧,而他,在本书的编辑中,也为它的降生,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

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可能是读者朋友都在思考的。受自己的学识、方法、外界条件的限制,我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谈了自己粗浅的看法,不尽言处,读者当会自思自想。

**刘永信**

1993年6月

# 目 录

|                                          |       |
|------------------------------------------|-------|
| 序.....                                   | (1)   |
| 导 论 变革求新生——中国文化现代化.....                  | (1)   |
| 一、“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驳“中国文化保护论”<br>.....       | (2)   |
| 二、文化: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中的集中反映 .....               | (10)  |
| 三、文化矛盾及其阶段性和阶级性.....                     | (16)  |
| 四、中国文化:并非“种文化”,而是历史演进的<br>阶级矛盾的意识形态..... | (23)  |
| 五、中国文化发展:变革与传统 .....                     | (30)  |
| 六、中国文化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文化否定官文化 .....             | (36)  |
|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上两巨人 .....                      | (45)  |
| 一、社会大变革的产儿.....                          | (47)  |
| 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 (52)  |
| 三、读书、教书、育人.....                          | (57)  |
| 四、文化史上承前启后者.....                         | (66)  |
| 五、中国文化发展阶段性原则的更新.....                    | (74)  |
| 第二章 孔丘——官文化的奠基者 .....                    | (81)  |
| 一、“礼崩乐坏”与“复礼”.....                       | (81)  |
| 二、君权与官制.....                             | (87)  |
| 三、天命观——官文化的世界观.....                      | (94)  |
| 四、“仁学”与“仁政” .....                        | (102) |
| 五、求官与为政 .....                            | (110) |

|                                 |       |
|---------------------------------|-------|
| 六、私立“管理干部学院” .....              | (118) |
| 七、名义忠恕信,知勇利禄德 .....             | (127) |
| 八、中庸之道 .....                    | (141) |
| 九、孟、荀的贡献 .....                  | (151) |
| 十、道统两千年 .....                   | (156) |
| 十一、官以载儒,儒以运官 .....              | (165) |
| <b>第三章 官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之骨架</b> ..... | (172) |
| 一、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大贡献 .....             | (173) |
| 二、神秘而深厚的中国官文化 .....             | (178) |
| 三、集权官僚制的理论基础 .....              | (183) |
| 四、以“教化”驯服被统治阶级 .....            | (189) |
| 五、“儒表法里”与“德刑相配” .....           | (194) |
| 六、“人与天地参”和君臣民的协同 .....          | (200) |
| 七、环环相扣的官僚系统 .....               | (206) |
| 八、“学而优则仕”与科举制度 .....            | (217) |
| 九、“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             | (224) |
| 十、官本位与官至尚 .....                 | (231) |
| 十一、“厚黑教主”的发现:求官与做官的“真言” .....   | (239) |
| 十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 (245) |
| 十三、做官发财——官权与私利的统一 .....         | (252) |
| 十四、民族和社会机体上的癌 .....             | (259) |
| 十五、对商品经济的阻碍 .....               | (264) |
| 十六、官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制约和污染 .....         | (270) |
| 十七、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 .....              | (275) |
| <b>第四章 毛泽东——官文化的批判家</b> .....   | (281) |
| 一、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表 .....               | (282) |
| 二、孙文——陈独秀——鲁迅——毛泽东 .....        | (287) |
|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 .....               | (300) |

|                              |       |
|------------------------------|-------|
| 四、对毛泽东的误读：武威胜于文化·····        | (306) |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313) |
| 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和继承·····         | (319) |
| 七、“造反有理”·····                | (330) |
| 八、斗争哲学·····                  | (335) |
| 九、阶级分析·····                  | (341) |
| 十、人民民主·····                  | (346) |
| 十一、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            | (352) |
| 十二、以“民”自居的最大的“官”·····        | (359) |
| 十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366) |
| 十四、千秋功过，历史评说·····            | (376) |
| 十五、“毛泽东热”——民主法制的呼唤·····      | (382) |
| <b>第五章 批判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导和重要</b> |       |
| <b>内容</b> ·····              | (391) |
| 一、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主要障碍的集中体现·····    | (391) |
| 二、向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路不通·····        | (397) |
| 三、无产阶级民主政治·····              | (401) |
| 四、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人类文化的主流·····     | (409) |
| 五、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文化的导向·····      | (415) |
| 六、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中克服官文化       |       |
| ·····                        | (420) |
| <b>结束语 再过两千年，回头看</b> ·····   | (426) |
| <b>跋</b> ·····               | (433) |

# 变革求新生——中国文化现代化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田汉先生为《义勇军进行曲》所写的这句歌词，随着它被法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唱遍中国，响彻世界。这是 20 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集中概括，也是现代中国人的共同忧患。中华民族的最大危险，看似来自外国的侵略，实则源于自身的保守落后。这种保守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文化作为人的社会意识，体现并作用于政治和经济之中。落后的文化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的保守，文化的变革也是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前导。中华民族的强盛发达，不能靠保守旧的经济、政治制度来实现，不能以落后的文化来抵御外来的侵略。只有变革，才能发展；只有在变革中才有中华民族的新生。

也正是在这最危险的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界迸发了激烈的冲突，几乎人类几千年来所有的文化，都集合于这种冲突之中。而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使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聚合的官文化与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民主文化的斗争。在这场贯穿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两位文化巨人——孔丘和毛泽东，作为两种文化的代表者，进行着一场超越时间的较量。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旗帜，将现代中国的劳动者——主体是农民——的利益和意识集合起来，向孔丘创立并延续了两千年的官文化和它的政治形式——官僚制度，展开初级的，但也是相当猛烈的批判；而孔丘的道统则通过他在现代的传人

——官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将得利益者而保守着，他们顽固地坚持官文化，反对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这场较量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几乎 20 世纪中国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内涵着这种文化上的较量，官文化不断地变换着形式和旗号，批驳着、阻挠着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进程，并毫不留情地、毫无仁义地支使那些既得利益主体去攫取权力和财富。

官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条件下中国官僚制度的意识形态，确曾在历史上起过其先进作用，然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它无疑已经没落，并成为阻碍工业文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的保守势力的思想武器。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民主文化对官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是中国文化变革的主要内容。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化现代化。

## 一、“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 驳“中国文化保护论”

20 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几乎人类所有的罪恶：战争、饥荒、瘟疫、奴役、杀掠，都一并降临不信基督教的中华民族。当 1900 年“八国联军”杀进北京，慈禧和载漪仓惶出逃，而“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功也在“洋鬼子”的枪炮下失效时，就已经注定了中华民族的这场世纪性的灾难。20 世纪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官僚、军阀、地痞、流氓，都在这个世纪大显身手，掠夺财富，贪污腐败，压迫民众，投机暴发，卖国求荣，种种行状，将人身上残存的动物劣性发挥到了极点。不过，这些个体的恶性发作，又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掌握权力，以各种方式使自己成为官，再把官的权力转化成资本，进而就以“开明”的方式建立与自己的资本统治相适应的“秩序”。也正是在这些冒险家在为自己及其子

孙后代“创业”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勇敢地抛弃旧观念,“向西方寻找真理”,从孙文的启蒙宣传,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国展开了从文化到政治、经济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历经一个世纪尚未完结,但变革的洪流却无情地荡涤着两千多年来积淀下的旧文化。

临近 20 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股“保护中国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大到尊孔读经,小到“保护、拯救京剧、地方戏”,着实热闹出了一个规模。更有一批圣贤子弟,将差不多已经熄灭了的“儒家道统”,从港台及海外那堆“现代新儒家”的柴灰中拾了来,大量著书论文,企图煽起“儒家的现代化”。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奇文:

梁漱溟之所以被看作是为现代新儒家开创山林的人物,显然是因为他在“五四”后不久出版的那本“震古铄今之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批孔、批儒、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响彻云霄的时候,他敢挺身而出,公开维护和提倡孔子儒家的学说,特别是孔子的人生哲学和道德伦理学说,这确实是需要有大无畏的反潮流勇气的。<sup>①</sup>

该文作者显然是把时代背景弄错了半个世纪,这种批孔、批儒、反传统的“雷霆万钧之势”,并不是在“五四”时期,而是出现于 50 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五四”前后的“批孔、批儒、反传统”,实则是由陈独秀这一介文人率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的对旧的儒家道统的批判。当是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文化界的统治势力绝非这批后生小子,而是前清的遗老遗少,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军阀的支持下,正顽固地

---

<sup>①</sup>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载《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 页。

坚守儒家道统。而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自从当上“大总统”以后，就明确地提出“国体虽更，民彝无改。”公开主张祀天、尊孔、读经，在他的支持下，康有为与陈焕章等人，成立了“孔教会”，积极活动，并得到官僚军阀的响应，企图通过立法，将“孔教”定为“国教”，以成就自秦汉一统以来历朝历代都未能实现的“文化大业”。

而中国之道统，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sup>①</sup>

“孔教会”的倡议，得到大部分军阀、官僚的赞同，其中有“辩师”张勋，更亲任“名誉会长”，并在各省成立分会或支会，竟成为一大政治组织。由“孔教会”发起的尊孔活动，才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主流”，就连孙文也对孔丘和儒学采取保护、利用、改良的态度，作为“革命”一方的国民党人不仅不批孔，而且还在戴季陶等人的鼓吹下，大行尊孔读经。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反潮流”者，绝非梁漱溟，而是陈独秀、鲁迅、胡适、毛泽东等一派新进的“小人物”。至于梁氏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过是其将当时所知道的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印度佛教的一些皮毛，加之对“孔教会”思路的心领神会而拼凑出来的“杂文”，之所以在当时会得到一些人的欢呼，就在于康有为等人以“正统”自居的尊孔伎俩已很难对付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而梁氏此书又别辟蹊径，把孔丘及其儒家道统与“中国文化”等同起来。至于为什么到 80 年代还有人把梁氏这块腐朽抬出来，尊为“文化名人”，不仅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好奇，更在于某些人别有用心。因为梁氏曾公开与毛泽东对抗，而为了否定毛泽东，凡是敢于反对他的，自然也就该抬举了。这已不仅是文化问题了。

“保护中国文化论”的源头，不会超过 1840 年“鸦片战争”。

---

① 梁启超等：《孔教会请愿书》，《民国经世文编》第 39 卷，第 48 页。

其真正的提倡者，应是张之洞，他在《劝学篇》里，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目的，是针对当时还有进步性的康有为的“维新变法”。

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sup>①</sup>

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着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sup>②</sup>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sup>③</sup>

“中体西用”之说，于今整整百年（《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沧桑巨变，自不待言，而以各种方式出来保护“中国文化”的言论和行动却不绝，其中自有深义在。并非一般知识分子出于“爱国”心就能领会，也决非什么“保种、保族”的逻辑。从袁世凯时代的“孔教会”到蒋介石“统一”中国后的“新生活运动”，都把儒家道统视为中国文化的本源，并宣扬儒学的立国之本。蒋介石在戴季陶、陈立夫等人的帮助下，将本来就不批判儒家道统的孙文“三民主义”进一步儒学化，将儒家道统说成是中国的“国魂”、“民族精神”、立国的精神和基础。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sup>④</sup>

中国人固有遗传的道德，存在我们脑筋中间，几千年中由祖宗传下直到现在。中国的固有的道德是不会变的。<sup>⑤</sup>

---

① 张之洞：《劝学篇》上。

② 张之洞：《劝学篇》下。

③ 张之洞：《劝学篇》下。

④ 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

⑤ 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

他并通过其政治权力,强行推行儒家道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智、仁、勇)。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主持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于同年7月1日在南昌成立总会,他自任会长。他给“新生活运动”规定了这样的“本旨”:

新生活运动的本旨,是要以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终不懈地实行下去。<sup>①</sup>

在南昌督剿赤匪,鉴于国内人心陷溺,民心消沉,四维不张,国势微弱,内未能共靖赤祸,外未能同溯国耻。爰本革命必先革心主义,倡新生活运动,欲以最简易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人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振迷惘之人心,复民族之朝气。<sup>②</sup>

历史已经证明,“新生活运动”不过是蒋介石为了强化其独裁专制,反对民主,为其以权力攫取财富,实行官僚资本主义而进一步愚弄民众、奴化民众的闹剧,这是与历史潮流相逆的,当然不能收到多少实效,这一点,连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新生活运动”却表现出现代专制统治者的一个基本思路:用集权官僚制时代的统治意识,来“驯化”民众,使之无条件地服从专制统治。而专制统治者只要“英明”和“开明”,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并利用国家机器来聚敛财富,形成官僚资本,以此来发展经济,并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从而造成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新的官僚专制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统治阶级不仅握有政治权力,而且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民众只能安份守己,服从领导,任劳任怨,即没有任何民主权利的“顺民”。从袁

---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训词》。

② 蒋介石:《为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国人》。

世凯到蒋介石，实际上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把毕生精力放在投机、钻营、争权夺位和镇压民众上，谁个懂多少儒学？但他们却非常清楚，对自己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那些受西方民主思想毒化了的“刁民”们不甘心被统治，聚众造反。于是乎，由一些御用文人们“献策”，将通行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道统拿出来，加以新式注解，用以“教化”民众，使之“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而有了“这样好的群众”，国家就可以兴盛，他们的统治也就稳定，并可以传之千秋万代。

临近世纪末，冒出了一个所谓“东亚模式”，其鼓吹者如李光耀、苏哈托等人，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众对专制权威的服从。不过，这里面的原则，早在 30 年代就已经由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予以实行，而其更为深厚的理论和历史基础，就是纵贯中国大地两千余年的儒家道统。李光耀等人，不过是悟到了其中某些道道，在特定的时期于几个小国（实际上，新加坡不过是个港口城市，但有其国家形式）中加以实行，取得了经济上的一些发展，用之于大国，则困难多矣。苏哈托对印度尼西亚的专制统治，除了几年的表面“繁荣”，就是他及其子女对占全国 1/5 财富的掠夺。而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加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不过，话说回来，蒋介石则是这种制度的首倡者。李光耀、苏哈托是不应享受其“专利权”的。

然而，当蒋介石胁迫、利诱张学良“易帜”，成就其“统一”大业之后，在中国推行这种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时，却比李光耀在新加坡的试验困难得多。虽然他的“四大家族”集团也确曾取得与苏哈托家族相媲美的“业绩”，但其政治统治却始终不尽心意。当然，他也和所有专制主义者一样，“义无反顾”地将责任推给民众的素质低下，而且受到西方的邪恶民主思潮的鼓动，不做顺民，不服从他所设计的“复兴”大业。也正是“新生活运动”在各